

中央和国家机关 司局级干部 自主选学专题研讨班讲座

专题一

低碳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型

张占斌◎主编

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

中央和国家机关 司局级干部 自主选学专题研讨班讲座

专题●

低碳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型

张占斌◎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低碳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型 / 张占斌主编. — 北京: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150-0211-8

I. ①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气候变化-影响-经济发展-研究-中国 IV. ①F124②F06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4442号

书 名 低碳经济与发展方式转型

作 者 张占斌

责任编辑 任 燕

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

(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100089)

电 话 (010) 68920640 68929037

编 辑 部 (010) 68929095

经 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010-63780231)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版 次 2012年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 18

字 数 2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150-0211-8 / F · 032

定 价 48.00元



目录

第①讲

“十二五”规划和中国发展问题

.....1 / 韩 康

第②讲

统筹城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析

.....47 / 张占斌

第③讲

新经济革命与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转型

.....75 / 张孝德

第④讲

低碳经济与中国应对策略

.....117 / 董小君

第⑤讲

创新中国城市发展模式

.....149 / 杨天举

第⑥讲

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

.....193 / 王元龙

第⑦讲

低碳经济与财税政策创新

.....229 / 许正中

第⑧讲

循环经济发展与城市环境保护

.....263 / 时红秀

在国家行政学院讲稿

第 1 讲

“十二五”规划和中国发展问题

【主讲人】

韩康，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会长。

【关键词】

经济总量 价格波动 贸易规模转变 发展模式 社会公平正义
体制改革 现代产业体系 路易斯拐点 后发优势 贫富差别

2011年是中国实施“十二五”规划的第一年。国内外重要媒体对“十二五”规划都非常关注，都想真正搞清楚经济增长全球第一的中国，在“十二五”规划中究竟要干些什么？

中央政府研究和制定“十二五”规划，是下了很大功夫的。“十二五”规划的完成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研究阶段，由中央决策机构组织专家、学者对若干重大发展与改革方面的问题分课题进行研究，作为起草决议文件的基础；第二阶段是文件起草阶段。我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的一些教授，参加了第一阶段关于“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变”课题的研究。今天想借此机会，谈谈我的一些研究心得和进一步的思考。

一、关于“十二五”规划的背景考察

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制定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，至少有两个大的背景情况需要考虑。

1. 中国的发展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

2010年全球经济有一个广泛热议的话题：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。根据日本内阁府2010年底正式公布的数字，日、中两国的GDP分



别为5.474 2万亿美元和5.878 6万亿美元。中国超过日本4 044亿美元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

对这件事，我认为首先是不可过分渲染，因为在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二经济强国之间，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对此必须有清醒的头脑。但同时，这件事也的确意义重大，因为这反映了中国真的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世界纪录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，中国1990年的经济总量GDP仅排列全球第11位，美国的经济总量是我们的10.15倍，日本是我们的9.63倍，苏联和巴西分别为我们的1.83倍和1.47倍。按总量算，中国还根本算不上经济大国。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，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快车道。如果再往前算一点，从1978~2010年，中国的GDP按照人民币不变价格增长了109.81倍，按照美元可变价格增长了43.54倍，人均GDP按照美元可变价格增长了31.57倍，为4 420美元。

一个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东方落后大国，在不到1/3世纪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，开创了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突出案例。

在今天的世界上，任何人都可以不喜欢中国和中国人，但任何人都不能不重视中国和中国人。中国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实际影响，无论是增长水平、价格波动、贸易规模，还是货币交易，都远远不是G12中大多数国家所能比拟的。

我们真的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了。



2.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，我们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矛盾

应该看到，我们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绩，也付出了同样巨大的发展成本。改革开放多年，已经积累了很多发展问题和发展矛盾，有些问题和矛盾还相当复杂、相当深刻，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。我认为，从改革发展的宏观视角看，可以归结为三个大问题。

（1）转变发展方式尚无重大改进。过去的讲法是转变增长方式，有人计算至少15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了，虽然也不断有所进步，但总体看不理想，为什么？这很值得研究。从理论上讲，任何一种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，其内在潜能和获利空间还尚未充分发挥时，虽然毛病和弊端暴露无遗，却很难进行根本改变。如许多国内出口企业是进行加工组装的“代工厂”，获利不高，为什么能长期坚持不倒？还是有钱可赚。既然有那么多便宜民工，为什么还要买先进设备和技术呢？然而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大的变化，原有发展方式真的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，怎么办？

（2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矛盾很多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大家都很穷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半斤八两。那个时候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让钱包鼓起来，尽快把经济搞上去。由此，效率优先、兼顾公平的提法很得人心。现在，国家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总量都相当可观了，同时，贫富差别的矛盾也相当突出。虽然改革开放使几乎所有社会人群都得到了实惠，但实际分配极不平等。其中一部分人获得最大收益，私人财富占有比例为40%左右（在美国不超过5%），还有很多人温饱



有余而富裕不足，更有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群，一个数量不菲的社会贫困人群。这怎么解释？出路何在？

（3）深化体制改革攻坚难度很大。这个话经常听到，但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呢？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特点不是草根发动、民间组织，而是由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策划组织的——当然是顺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。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策划组织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、国企股份制改造、特区建设、证券市场运作等改革举措，难以想象能搞得起来。现在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目前最不好改革的许多领域，如财税与金融体制、垄断行业、资源价格、事业单位，等等，都同政府和政府体制的改革相关。由政府进行策划组织的改革，最终到要改到自己头上了，要触动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了。这就是深化体制改革难题的意思。

中国的“十二五”规划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。

3. “十二五”规划体现了新的发展思维和新的发展理念

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，我们已经搞了十个五年计划，一个五年规划。我认为“十二五”规划的设计和完成是很有新意的。这种新意主要不是表现在具体的政策、方针、措施上，而是突出地表现在新的发展思维和新的发展理念上。

“十二五”规划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整个规划的主题，即总体指导思想。我注意到，“十二五”规划在具体表述科学发展观的时候，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表述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。

在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的报告中，对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权威



性的理论表述，即核心是以人为本，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，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。三句话言简意赅，非常精到。请大家注意，“十二五”规划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表述，除了在这三句话前加了更加注重的语气词外，又加了一句话：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这样，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概括就从三句话变成了四句话。

我认为，这句话的增加非同小可，显示了执政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水平的深化，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。纵观“十二五”规划，都体现了对这个更加丰富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。

由此，“十二五”规划在国家战略规划和发展指导上，把经济增长、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三者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摆放。改变以往在五年规划中对增长指标的核心设置，调低宏观增长预期指标，明确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放在主攻方向，第一次提出民生福利和经济发展同步的重要方针。

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，认为过去大讲特讲GDP错了，现在要一切推倒重来。我不这样认为，因为一切问题都要放到相应的发展环境中去考察，才能得出正确认识。如前所见，在1978年，我们九亿多人口的GDP只有3 624亿美元。这时候强调要把经济规模、经济总量做大，恐怕不仅仅是各级政府的冲动。一个大国的现代化发展难道可以没有经济总量的基本要求吗？问题在于，即使有了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力量，政府组织经济和干预经济的力量也仍然很强大。把GDP作为宏观优先指标的并不是市场，而是各级政府。是各级政府把GDP作为第一政绩指标从而优先发展指标，才导致



了一直以来那种把GDP指标放到统领增长和统领发展的不恰当位置。

可见，对增长引领指标的认识和转变是有条件的。现在已经具备了两个基本条件：一是经济规模、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四十多倍，同时过度依赖增长型发展的种种弊端已经暴露无遗；二是政府的发展认识和发展理念已大有进步，特别是中央政府率先垂范，从“十二五”规划开始，在国家战略规划层面设计了更加合理、更加完善的宏观增长引领指标系统。

二、关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

“十二五”规划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——发展现代产业体系。请大家注意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。

为什么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？我认为，它的背景就是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进步。要全面了解这个问题，就需要对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现状做一点深入分析。

1. 当前中国工业化发展现状

远一点说，从新中国成立至今，近一点说，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到现在，中国工业化已达到了什么水准呢？国内理论界有两种研究成果供参考。第一种研究提出，到2007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.1%，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社会物质总产值67.4%，根据国际经验，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。第二种研究进一步提出，1999~2007年，我国新型重工业的增加值明显快于轻工业，主要由消



费结构升级、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基础设施带动，可以判定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。

我个人的研究有所不同。总体看，我同意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时期，但由于中国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很大，合理评价国家整体工业化发展状况非常困难。例如，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例虽然只有10%，但就业比例却仍高达38.1%，近40%，其他才是二、三产业的就业，因此不能对中国工业化现状估计过高。

然而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积累阶段和初期发展阶段，进入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。

问题是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子呢？我认为，虽然我们在主观上很想走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，但从总体看，并没有走出传统工业化的路子，粗放式发展和资本积累的特征十分明显，可以说还是以“旧型工业化”为主。

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粗放式特点，首先表现在增长伴随着很高的耗费水平。2006年，中国单位GDP能耗8.9吨标准油，为国际平均水平的3倍，其中煤耗为7.1倍，油耗为1.3倍。2008年，中国单位GDP钢铁消耗每万美元1.7吨，是国际平均水平的5.7倍，为巴、印、俄的6.1倍、2.7倍和2.1倍。2000年，中国单位GDP的淡水消耗每万美元4 600立方米，是国际水平的3.6倍，为巴、俄两国的5.9倍和1.6倍。

再看能源耗费结构的比较。2006年，国际能源机构IEF国家的平均能源结构是，煤炭20.5%、石油40.3%、天然气21.5%、核能12%、自然能源5.8%。中国2008年的能源消费结构是，煤炭68.67%、原油18.68%、天然气3.77%，水、风、核加在一起为8.89%，很显然，煤炭



能源占绝对主导地位。到2009年的各项能源耗费增长比较中，煤炭仍然位列第一。现在，国内很多人把低碳经济的调子唱得很高，但我们的头脑必须清楚，实际上距离低碳经济还相差得很远。我认为，低碳经济要讲，但实际要做中国的中碳经济或中低碳经济的事情。

最后必须说污染，这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付出的最沉重代价之一。2006年，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每万美元29.3吨，为国际水平3.6倍，欧元区7.6倍。空气颗粒物含量每立方米73微克，为世界水平1.5倍，远高于俄、巴，略高于印。2008年，长、黄、珠、松、淮、海、辽七大水系，严重污染而不能使用水质比例已达20%，辽、海分别达到32.5%和50.8%。2008年环保部检测447个城市出现酸雨比例为56.3%。

我的认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的污染治理和污染扩展之间，二者谁强谁弱，仍然说不清楚。我们信息体制的特点，是报喜的东西层层扩大，报忧的东西层层衰减，真正严重的问题和矛盾很不容易发现，只有在问题、矛盾激化之后，方才露出水面。中国最真实、最深层的污染状况，恐怕谁都难以真正知道。我经常讲，污染并不可怕，隐而不知的污染才最可怕，因为谁都毫无防备，一旦爆发就可能是大灾难。

为了研究的深入，现在我想提一个问题：以上中国的粗放式工业化发展虽然不好，但如果支撑这种发展的资源条件仍然充裕，是否可以继续走下去呢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。

然而，现在的问题在于，中国以往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基本支撑条件正在发生重要变化，这些变化很有可能使原有的发展路子很难继续



走下去了。

2. 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基本支撑条件的变化

那么，什么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的基本支撑条件？从体制角度分析，当然是市场经济的推动，按照我的观点，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的强大推动。有人说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“国家资本主义”，其定义是否规范、合理，可以商榷。

什么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增长的基本支撑条件？从发展角度分析，我认为，三十多年的工业化高速增长主要靠三大比较优势：第一，劳动力的大量低价供给；第二，资源环境大量低偿耗费；第三，土地资源大量低费提供。我讲这三条完全没有贬义。看看近代和现代经济史吧，即使是现在的最发达工业国家，都很难避免这个过程。当然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，还要加上它们对殖民地和被侵略国大量财富掠夺所进行的积累。

中国现代工业化的最初发展，是在长期战争的烂摊子上开始的，一无技术，二无资金，三无管理水平，又没有外来积累，不靠这三个比较优势又能靠什么呢？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工业化逐步起飞，技术、资金和管理这三个要素仍然非常短缺，还是不能离开这三个比较优势。

对中国发展而言，劳动力的大量低价供给即农民工的大量低价供给，是最为重要的发展条件。中国许多产品的竞争力至今在世界上罕见对手，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优势无人能比。但是，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这个优势还能撑多久。用经济学的语言讲，就是中国的“路易斯拐点”是否快要到来。路易斯曾经是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经



济学奖的获得者，他关于“路易斯拐点”的分析非常有名。

所谓“路易斯拐点”，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路易斯在研究拉美国家发展中的一种现象。路易斯在他的研究案例中发现，许多落后贫困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初期，由于存在城乡比较收入差异，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进入城市工业领域寻找工作，人数规模很大且工资低微，为工业化提供了很低的人工成本，产品出口颇具竞争优势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农村输出劳动力总量减少，到某一时点就会出现大量递减，由此带来的一切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消失。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优势替代，这个国家工业化过程就会衰退。这就是“路易斯拐点”。

中国是否已经到了“路易斯拐点”呢？虽然这是一个国内有很多争议的问题，但已经出现的许多信息值得认真研究。2007年，第一个最重要的数据信息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，该报告提出，到2006年底，全国70%以上的农村家庭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持续供给了。当时引起不小反响。我看到这个报告后不完全相信。我查了一下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的的数据，发现全国农民工数量减少的农民年龄组在增加，且幅度较大。2004年就出现20岁的农民工越来越少，2006年减少的年龄组扩大到30岁，2010年是35~40岁。

我个人的观点是，中国还没有到“路易斯拐点”，但距离这个拐点越来越近。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东西南北的区域差距很大。以郭台铭先生举办大规模“代工厂”为例，在深圳继续大量招工已经非常困难，大幅度提升工资又会丧失竞争优势，于是开始向河南和重庆两地大规模转移，成功开办了两个各有40多万职工规模的巨型“代工厂”。河南和重庆是中、西部的代表地区，能招到这么多人——主



要是农民工，说明中、西部地区仍然有农民工的供给潜力，但据说招工过程也颇费周折，一是依靠政府行政动员力量；二是工资远不是廉价了，同深圳办厂时期大不相同。这也告诉我们，“路易斯拐点”虽然不是明日之事，但也绝不是遥远之事。中国依赖人工成本优势打天下的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。

这里我还要讲一个重要的观点，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“中国制造”的出口竞争优势，会不会很快消失？我的回答是，不会！东南亚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，正在以劳动力便宜的武器试图全面取代中国的出口优势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，但10~15年之内还不要紧。因为“中国制造”能在全球横行，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有两个法宝：一个是劳动力便宜；另有一个是产业集群——某一行业的几乎全部生产经销环节都集中在一个地区。配置一个产品部件，可以骑自行车甚至步行就可以买到。东南亚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做到劳动力便宜容易，做好产业集群就比较困难了。当然，讲这个优势绝不等于我们可以在低端产业链的现状上高枕无忧。

支撑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第二个比较优势——资源环境大量低偿耗费，优势递减的趋势就更加明显。根据各方面预测，目前我国45种最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中，在2010年可保证需求的只剩23种；到2020年将仅剩6种，保持必要增长所需矿产资源必须依靠大量外汇购买。这个信息几年前还是相当保密的，现在国家发改委已正式用了这个材料。

再讲中国的石油资源状况。2004~2009年，全国动员1 700多名科技工作者，历经5年，花费1.1亿元资金，对全国150多个盆地进行摸底